

DOI: 10.13288/j.11-2166/r.2018.01.019

《伤寒论》组方与术数关系探讨

——兼与“《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研究的意义”一文商榷

邢玉瑞*

(陕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陕西省西咸新区西咸大道, 712046)

摘要 “《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研究的意义”一文认为基于现代运用数学思维方式对《伤寒论》组方规律研究为其薄弱环节, 提出从象数结合的角度研究《伤寒论》组方的术数机制, 涉及到《伤寒论》组方规律研究的导向与方法等重大问题。通过对术数概念演变的梳理, 术数与象数思维以及数学方法关系的分析, 指出术数是中国古代哲学、科学、宗教信仰的综合, 象数与术数之数的运用不同于数学方法。《伤寒论》组方的药物、剂量、煎服法等问题, 本质上是基于临床经验总结的科学问题, 应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研究, 将此类科学问题回归到术数机制研究则值得商榷。

关键词 术数; 伤寒论; 组方机制; 象数思维; 数学方法

《中医杂志》2017 年第 11 期刊登了“《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研究的意义”^[1]一文, 通过对《伤寒论》组方规律研究现状的分析总结, 认为运用数学思维方式来辨治疾病是其不足, 提出从象数结合的角度, 对《伤寒论》113 方的药物、剂量、煎服法及预后判断等进行归类、分析, 逐方阐述其可能的象数机制, 还原中医处方的基本尺度。该文涉及术数、象数、数学方法等与《伤寒论》组方规律相关的研究问题, 具有一定的后迪意义。但由于作者对相关概念没有进行理性的辨析与明确的说明, 很容易误导后学, 故此商榷如下。

1 关于术数的古今认识

要研究《伤寒论》组方的术数机制, 首先必须明确术数的内涵与外延。术数, 也称为数术, 其概念不同时代以及不同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术数之兴, 多在秦汉以后, 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 实《易》之支流, 傅以杂说耳。”又说“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 不切事而犹近理, 其余则皆百伪一真, 递相煽动, 必谓古无是说, 亦无是理, 固儒者

之迂谈。”今人对术数的看法大体与此相近。如《辞海》^[2]认为, “术数, 亦称数术。‘术’指方法, ‘数’是气数, 即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现象, 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汉书·艺文志》列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种, 并云‘数术者, 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但史官久废, 除天文、历谱外, 后世称术数者, 一般专指各种迷信, 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命相、拆字、起课、堪舆等”。冯友兰^[3]认为, 术数的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 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 通过征服自然使之成为人类服务。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 就变成了科学。这些自然力是什么, 其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 可是在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谭伟^[4]指出, 数术是以天文、历法、乐律等科学知识为基础, 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理论, 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架, 以数为手段, 以种种方法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 并以此推知人事, 趋吉避凶, 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命运的方法或技术、手段, 包括望气、占卜、看相、风水、星相、算命、测字、圆梦等。

上述认识大致是基于现代人的认识评判古代术数。其实术数在古代是一种专门之学, 其地位和内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3CB532002)

* 通讯方式: xingyurui@163.com, (029) 38185228

涵因时代而异,大体上经历了从巫术到科学与迷信混杂,再到迷信的演变过程。陶磊^[8]曾对巫术到数术的嬗变有过专门论述,认为数术与特定的天道观宇宙论联系在一起,本身具有信仰的内涵,其兴起在东周以后。数术从实用层面上看,与巫术性质相近,都是一种趋吉避凶之术;从信仰的角度讲,二者有根本性的差异,巫术的背后是神灵信仰,而数术的背后是天道信仰;在具体的操作上,巫术是通过与神灵沟通来了解吉凶,数术则是通过推求自然之数判断吉凶。古人在判断吉凶的方法上,大致经历了从巫通神,到借助灵物占卜,最后到通过推数来确定吉凶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与人类理性化的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不仅反映了古人信仰的改变,也反映了人类智慧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迁。数术中出现了所谓的“原科学”。谭伟^[9]指出,数术是从巫文化的氛围中孕育和分化出来的,比巫术更系统化和理性化,更科学,有了质的变化。认为数术是古人的科学,究其原因:1) 数术以天文、历法、乐律等为基础;2) 引入了数的思想;3) 信仰的是具有自然力而不是具有人格意义的天命;4) 通过对自然现象的仔细观察,运用归纳推理解释其原因,然后运用演绎推理发现其变化规律,从而作出其对人类吉凶的判断。它的操作过程、认识过程、推理方法与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基本一致。同时又论述了数术从科学到迷信的演变问题,认为从学术层面讲,数术的根本目的是对自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寻找其规律性,以指导人类的活动,故可说数术是科学。后世流于迷信,不在于数术本身,而在于研究和运用它的人及其使用的方法。如宋会群^[9]通过对中国术数文化史的研究认为,术数源于先秦,成于秦汉,盛于唐宋,衰于清。秦汉时指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天人合一、后天八卦等为基础理论的占卜术、方术及推理天人关系的知识系统,方法上的突出特征是以象数、干支、符号等比拟人、事物、社会,寻其机巧,达到经邦治国、占断吉凶、观象制器的目的。秦汉以后,术数、方术、方技逐渐混淆合流,唐宋时又加进了太极、先天八卦和“图书之学”等理论,哲理性较浓厚,断吉凶的方术大为发展,门类及内容更加丰富。唐宋以后,天文、历法、算术、形法、医术等逐渐与占卜分离,清中叶以来,术数专指以阴阳五行、太极八卦之理推算个人命运吉凶休咎的方法与方术,作为知识系统,已是“百伪一真”。

从上述讨论可见,术数包容了中国古代哲学、科学、宗教信仰乃至其背后的思维方式等,特别是秦汉时期的术数。刘乐贤^[7]认为,早期数术是一套广为流行且具有实际功效的技术和观念,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科学知识加迷信法术,并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李零^[17-18]则明确指出,数术方技既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也是中国古代迷信的渊藪。

2 象数思维与数学方法

李零^[35]提出,“‘数术’一词大概与‘象数’的概念有关。‘象’是形于外者,指表象或象征;‘数’是涵于内者,指数理关系和逻辑关系。它既包括研究实际天象历数的天文历算之学,也包括用各种神秘方法因象求义、见数推理的占卜之术”。由于术数要借助于“象”“数”来推理,故象数思维自然成为术数方法的基本环节。近年来随着对国学以及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研究的深入,象数思维的研究也受到高度关注,并取得一定成果。一般认为,所谓象数思维,是指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数字等象数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通过类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认知世界的联系,从而构建宇宙统一模式的思维方式。象数思维方法中的“数”侧重于定性表象,这种“数”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9]。宋会群^[9]通过对术数的研究也认为,“数”在秦汉指历数,以后指气数、运数、数理,成为可赋其象以归纳推理人与自然、社会某种关系的不能精确计算的纯数。张其成^[10]则认为,在古代“数”有计量、通神、明理三大功能,其通神、明理功能的增强即形成“数术”。而在中医学中,象数之数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模式或模型用于理论的推演与建构,如天、地、人三才与三部九候、天五地六与五脏六腑及五运六气等,看似是数学计量的一些问题,也隐含着象数推理的内容,如《灵枢》有关经脉长度与血气运行度数的论述,即借助了象数推演^[11]。大概正由于此,邱鸿钟^[12]称“中医古典数学主体上是一种以数为‘象’进行推演的哲学”。

由上可见,不论是象数之数还是术数之数,与一般数学之数不同,它没有单位,没有大小可比性,也没有精确计算之性,更是只有整数没有小数,更多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质的而非量的特征,主要并不是用来计算,而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应用化和实用化。象数思维与运用数学所提供的概念、理论和方

法, 对研究对象进行量的分析、描述、推导和计算, 以揭示认识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数学方法, 并无相关性。

3 术数与《伤寒论》组方的关系

“《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研究的意义”一文认为, 基于现代运用数学思维方式对《伤寒论》组方规律研究为其薄弱环节, 提出从象数结合的角度, 对《伤寒论》113 方的药物、剂量、煎服法及预后判断等进行归类、分析, 逐方阐述其可能的象数机制, 恰恰是混淆了术数、象数思维与数学方法的区别。从“《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的角度而言, 可以区分为古代哲学思想、科学、思维方式乃至宗教信仰等不同层次或方面, 恰好缺少数学方法, 故不可能借助于术数方法解决《伤寒论》组方的药物、剂量、煎服法等问题。即或是最初的组方受到术数方法的启发, 其后也必然经过临床实践加以验证, 无效者自然被淘汰。反之如果将数学之数与象数、术数之数混淆使用, 则很容易将研究工作引入歧途。具有代表性的可谓刘力红^[3]对《伤寒论》组方用药规律的术数说明, 如其解释小柴胡汤时认为, 该方用药七味, 七为火数, 这说明它用的是火的格局, 与少阳相火相应。柴胡用八两, 黄芩用三两, 三、八正好是东方之数, 正好是寅、卯、辰之数。这一君臣药的用量, 就把整个少阳的性用以及少阳病的欲解时相烘托出来。但《伤寒论》中用柴胡的方剂 7 首, 有 6 首中柴胡与黄芩相配伍, 其中小柴胡、大柴胡、柴胡桂枝干姜汤 3 方柴胡用八两, 柴胡桂枝汤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用四两, 柴胡加芒硝汤则用二两十六铢; 6 首方剂中黄芩用量也有 3 方并非三两, 如柴胡桂枝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为一两半, 柴胡加芒硝汤则为一两。上述用量恐怕难以用象数之学完全加以说明。况且《伤寒论》113 方中, 药用 7 味的方剂共 14 首, 并不限于小柴胡汤, 其他如大青龙汤、半夏泻心汤、旋覆代赭汤、葛根汤等, 并不完全与少阳相火相关。另如对白虎汤、炙甘草汤大枣用三十枚, 当归四逆汤大枣用二十五枚等解释, 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如此这般, 将活生生的人体生理、病理变化与药效学研究, 填充在古代八卦的占筮构架之中, 以占筮代替对疾病的诊治, 以巫术代替医学, 将对医药学的研究转换为对术数的研究, 势必造成中医学术的倒退。

《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的研究, 充其量是发

生学研究的一个方面, 有助于厘清《伤寒论》组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历史背景, 明确其组方用药的思路, 但尚未涉及其发生的实践经验基础。因此, 很难说探索《伤寒论》中各药物剂量的术数联系, 就能从经方这个源头上引导中医临床回归, 为恢复中医传统理论本色提供科学依据。

纵观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 大体上都是从巫术走向科学, 从自然哲学不断分化出新的学科, 在学科不断分化的基础上, 当代又逐渐走向融合发展的道路。反观中医学术的发展, 学科分化不足十分明显, 由此也造成了学术发展的停滞不前。而《伤寒论》组方的药物、剂量、煎服法等问题, 特别是各药物的剂量关系, 本质上是基于临床经验总结的科学问题, 目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方药量效学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果^[4], 而如果将此类科学问题回归到科学与迷信交织在一起的术数机制研究, 则值得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 [1] 龚轩. 《伤寒论》组方术数机制研究的意义 [J]. 中医杂志, 2017, 58(11): 901-904.
- [2] 夏征农, 陈至立. 辞海 [M]. 6 版.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2097.
- [3]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 6 卷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117.
- [4] 谭伟. 中国数术的演变: 从科学到迷信 [M] // 项楚. 中国俗文化研究: 第四辑. 成都: 巴蜀书社, 2007: 63-75.
- [5] 陶磊. 从巫术到数术: 上古信仰的历史嬗变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8, 158, 163.
- [6] 宋会群. 中国术数文化史 [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17.
- [7] 刘乐贤. 简帛数术文献探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
- [8] 李零. 中国方术考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
- [9] 张其成. 中医哲学基础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4: 289-291.
- [10] 张其成. 象数易学 [M]. 北京: 中国书店, 2003: 90-91.
- [11] 邢玉瑞. 中医取象运数之数的内涵考察 [J]. 医学争鸣, 2014, 5(3): 13-15.
- [12] 邱鸿钟. 医学与人类文化 [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403.
- [13] 刘力红. 思考中医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67-268, 312, 317.
- [14] 全小林. 方药量效学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4-29.

(收稿日期: 2017-08-11; 修回日期: 2017-09-20)

编辑: 黄 健